

# 全球智库半月谈

特朗普经济国家主义的代价：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

从规制制定者到规则接受者？对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评论

华盛顿逐渐敌视中国，美国人民观点如何？

银行救援与全球银行格局

增值税对中国制造业的动态影响

税收改革评估之新探——基于 IMF 新数据库

分区制对房价的影响

本期编译

安婧宜

侯书漪

刘铮

李笑然

宋海锐

史明睿

伊林甸甸

杨茜

张寒堤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b>顾问</b>	张宇燕			
<b>首席专家</b>	张 斌		姚枝仲	
<b>团队成员</b>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史明睿	科研助理

### 国际战略研究组

<b>组 长</b>	张宇燕			
<b>召集人</b>	徐 进		<b>协调人</b>	彭成义
<b>团队成员</b>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mailto: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 目 录

## 世界热点

**特朗普经济国家主义的代价：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 . . . . . 6**

导读：特朗普总统的经济国家主义措施使美国面临贸易战成本外，导致了外部对美直接投资减少。数据表明，对美净直接投资额已经接近 2008 年危机后低点。在美国减税、经济增速提高、政府限制对外投资的条件下，对美净直接投资额仍然减少，说明特朗普敌视全球化的政策正在使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紧密程度加深。

**从规制制定者到规则接受者？对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评论 . . . . . 8**

导读：美国自二战以来在全球经济中一直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动摇了美国 70 年来建立和倡导的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美国的盟友和其他贸易伙伴正推进一系列的经济部署将美国排除在外，这将有损美国利益，美国将有可能成为规则接受者。中国正在全球规则制定的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特朗普汽车关税将把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推向火坑 . . . 11**

导读：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将所有类型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25%。由于关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此举将会导致汽车行业的进出口都受到冲击，带来行业产量下降和工人失业。而如果在此基础上，其他国家对美国施加报复，影响会更加明显，同时出口端将比进口端承受更大的损失。

**华盛顿逐渐敌视中国，美国人民观点如何？ . . . . . 18**

导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在多项议题上的对华态度逐渐转向强硬。然而，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如何？几十年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者基于民调数据认为，虽然美国民众对华态度一直相对稳定，但近期美国的社会情绪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欧洲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 . . . . . 21**

导读：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个关于他看似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理论的民间学派已经发展起来。然而，在他对待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的态度这一问题上，没有多少理论可以理解特朗普。

## 全球治理

**银行救援与全球银行格局 . . . . . 25**

导读：当银行大而不倒的时候，银行救援方案会因其全球范围的本质与国内规定的错配而无法奏效。这篇专栏认为当一个“单点进入”的方案足够好时，它可以满足当地规则

机构的利益，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考虑到单国政治限制与激励，有效的救援方案不一而足。

## 聚焦中国

### 增值税对中国制造业的动态影响..... 27

导读：增值税的执行需要追溯到两个公司间交易的准确记录。本专栏描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征税流程的数字化管理来加强执法力度，从而在短期内提高税收收入。但是，执法力度的增加会导致公司在中期收缩，减少长期的税收收益。

### 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商事法庭提上日程..... 32

导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各异，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伴随着大量的跨国商务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在西安和深圳分别成立了两家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作者认为，一旦中国掌握了区域内国际商事争端的仲裁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都有可能面临威胁。

## 经济政策

### 税收改革评估之新探——基于 IMF 新数据库 ..... 34

导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各异，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伴随着大量的跨国商务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在西安和深圳分别成立了两家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作者认为，一旦中国掌握了区域内国际商事争端的仲裁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都有可能面临威胁。

### 分区制对房价的影响..... 37

导读：政府通过分区制政策来限制住房供应。实际证据表明，分区可能对土地价值产生巨大影响。我们采用间接方法，将房地产价格与边际供给成本进行比较，发现分区制将提高独立式住宅、公寓相对于供应成本的平均价格。

### 本期智库介绍 ..... 40

## 特朗普经济国家主义的代价：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

Adam S. Posen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的经济国家主义措施使美国面临贸易战成本外，导致了外部对美直接投资减少。数据表明，对美净直接投资额已经接近 2008 年危机后低点。在美国减税、经济增速提高、政府限制对外投资的条件下，对美净直接投资额仍然减少，说明特朗普敌视全球化的政策正在使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紧密程度加深。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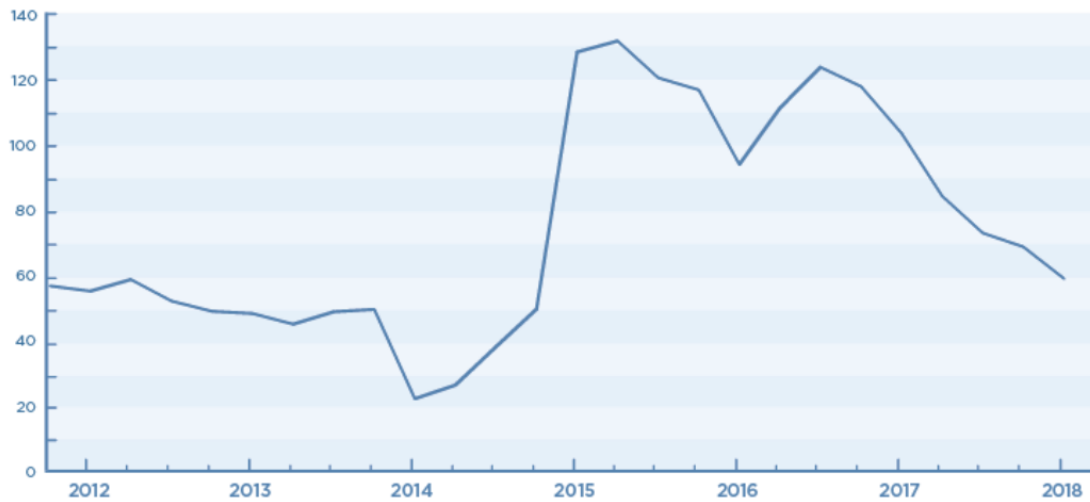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既针对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又针对其竞争对手。一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他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使跨国公司（无论是外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对美国的净直接投资几乎降至零。企业投资从美国的转出将减少美国长期收入增长，减少美国高薪工作岗位，并加速全球商业转出美国。

几个月前，我在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双边霸凌政策咄咄逼人，并且放弃了以现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使得世界经济走向后美国引领的世界经济时代。在后美国经济世界，所有投资都更加不确定且政治化。这显著影响大型投资的长期性商业决策，例如关于设施建设、跨国兼并收购以及对研究设施和研究人员的投资的决策。

本文观察了 2016、2017、2018 年第 1 季度进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最新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2016 年第一季度，净流入总额为 1465 亿美元。2017 年同一季度为 897 亿美元。2018 年，它降至 513 亿美元。这种下降并非由中国投资的变化引起，来自中国投资与对中国投资同增同减，净额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衰退是美国长期商业承诺的诚信力普遍下降的结果。从趋势指标看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呈下降趋势。2018 年的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四季度移动平均值已回落到 2012 年的危机后低点（见下图）。

图 1 对美净直接投资降至危机后低点（单位：十亿美元）



注：数值为四个季度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实际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还要糟糕。近期，美国国会正在研究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该法案会提高对美投资规则要求。担心未来进入美国市场受阻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会在类似情形下选择提前投资，通过在法案颁布之前完成投资，以避免受困于即将到来的关税壁垒。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积极影响，净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出现下降。

同时，美国境内公司的对内投资也在减少，表明他们受美国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正在重新评估对美新增投资，只是时间上相对外国跨国公司有一点滞后。政策上，美国的税率较低，GDP 增速较高，实施了一系列限制美国对外投资的正式及非正式措施。但如果综合这些条件，2018 年剩下的时间内仍会看到美跨国公司增加境外投资，将说明很多问题。

总之，对美净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作为全球经济走向后美国时代的风向标指标。这些指标的变动表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已观察到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敌对态度，世界经济可能在走向非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时代。

---

本文原题为“The Cost of Trump’s Economic Nationalism: A Los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本文作者 Adam S. Pose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从规制制定者到规则接受者？对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评论

Matthew P. Goodman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美国自二战以来在全球经济中一直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动摇了美国 70 年来建立和倡导的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美国的盟友和其他贸易伙伴正推进一系列的经济部署将美国排除在外，这将有损美国利益，美国将有可能成为规则接受者。中国正在全球规则制定的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编译如下：

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其对美国短期经济利益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秩序的伤害。这些成本是实际存在且可衡量的。但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向其他人承认美国二战以来在全球经济中一直扮演的规则主要制定者的角色。从欧洲、越南以及中国的表现来看，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出现。

特朗普总统对钢铁、铝和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危害越来越大，越来越具体。影响的范围从依赖进口钢材的美国制造工厂的工人被解雇，到将使全球经济增长到 2020 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

（IMF 预计，如果特朗普总统兑现承诺，对另外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那么到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少 0.5 个百分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估计，如果按照特朗普政府在今年夏末的威胁，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近 2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将会因此付出代价。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这一数字将是原来的三倍还多。

特朗普总统的严酷的贸易行动和声明也动摇了美国 70 年来建立和倡导的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这也许就是总统的意图，但这种方式将会以牺牲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根据冷战时期的贸易法第 232 条，以显而易见的商业目的限制来自进口钢铁和汽车的竞争，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精神。中国这样的其他国家同样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者实行保护主义反制措施。与此同时，与加拿大、欧盟以及日本等盟友展开对抗，明显削弱了他们与美国一起追求共同目标的意愿，如共同挑战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美国从全球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规则破坏者，很可能会在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纯粹的统治者后结束。事实上，美国的盟友和其他贸易伙伴正在推进一些经济部署，这些部署不包括美国，因为这些条款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欧盟和日本本月签署了一项全面的“经济伙伴协议”（EPA），该协议将为代表全球经济四分之一以上的经济领域建立新的贸易规则。除此之外，日本还同意为 200 多家欧盟“地理标志”提供特别保护，如戈尔根朱勒干酪和香槟品牌。如果这成



为了全球标准，那么美国公司 Illinois 将不再能够以这种名义出售帕尔马干酪产品。

更有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是欧盟-日本在数字贸易方面的条款。由于欧洲在个人隐私方面的政治敏感性较高，布鲁塞尔并未同意日本提出的数据自由流动协议。相反，双方承认彼此隐私制度的“合理性”，允许个人信息的转移，但不将数据自由流动作为一项可执行的承诺。这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它们都希望将数据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中，并限制跨境流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核心内容，就包括不执行此类数据本地存储以及一系列的数据相关条款。TPP 是在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下谈判达成的全面贸易协定，而特朗普总统选择了退出这一协议。

越南是 TPP 协议的成员国，它利用美国缺席的机会，在数据问题上对美国企业没有任何优待。6 月下旬，越南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网络安全法律，要求 Facebook 和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在越南开设办事处，将越南客户数据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上，并且在政府提出删除在线内容后，企业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删除。美国驻河内大使馆对此非常担忧，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作出警告，即新政策可能会违反越南的国际贸易承诺。如果美国仍是 TPP 成员国，并且没有破坏 WTO 协议，这一抗议活动将更有说服力。

所有这些对中国都是好消息。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Samm Sacks 指出的，中国正致力于为全球网络治理制定规则。中国的首选方案不仅包括本地化要求和对出境数据传输的限制，还包括提出中国的技术标准和网络空间主权构想。Sacks 认为，在这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互联网的基本原则，即在线自由、隐私、自由国际市场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不复存在。

中国成为全球规则制定者的新角色，将边界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一带一路”倡议，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互联互通计划。6 月下旬，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两项规定，成立了两个法院来调解与贿赂有关的纠纷，其中一家位于深圳，负责处理沿海“一路”发生的纠纷，另一处位于西安，负责处理沿陆路“一带”的案件。毋庸置疑，健全法律机制来管理“一带一路”项目中不可避免的商业纠纷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北京选择建立自己的法庭而不是依赖现有的国际仲裁中心（位于香港、伦敦和纽约），这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舞台上新的强有力的规则制定者。

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让其他人来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危险性。在白宫的敦促下，美国商会将于 7 月 30 日举办一个印太平洋商业论

坛。届时，美国国务卿 Mike Pompeo、商务部长 Wilbur Ross 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将为这一重要地区提出经济和商业愿景。对这些官员来说，超越陈词滥调，提出一种可信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取代以关税为基础的方式，使美国重新回到其作为全球规则制定者和规范制定者的传统角色，这一点很重要。

---

---

本文原题为“From Rule Maker to Rule Taker?”。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为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和高级副总裁，是 CSIS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负责人，曾是负责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的白宫协调人，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室主任，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本文于 2018 年 8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特朗普汽车关税将把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推向火坑

Sherman Robinson, Karen Thierfelder, Jeffrey J. Schott 等/文 刘铮/编译

导读：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将所有类型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25%。由于关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此举将会导致汽车行业的进出口都受到冲击，带来行业产量下降和工人失业。而如果在此基础上，其他国家对美国施加报复，影响会更加明显，同时出口端将比进口端承受更大的损失。本文编译如下：

据报道，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将所有类型汽车（包括 SUV、货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25%，其依据与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法律一致。一项新的 PIIIE 分析显示，该行动将使这些部门的产量下降 1.5%，并导致 195,000 名美国工人在 1 至 3 年或更长时间内失去工作。整个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将减少 1.9%。<sup>1</sup>分析假设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NAFTA）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获得豁免（与钢铝关税覆盖范围一样）。潜在的贸易行动对美国进口的影响将超过 2000 亿美元。

如果其他国家对同类产品进行关税报复，那么产量将下降 4%，就业岗位减少 624,000 个，同时造成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5% 的工人失业（表 1）。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业出口将比进口受到更大的损失。不过任何一种情形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都很小。

5 月 23 日，美国商务部发起了一项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国家安全调查，调查结果和建议将于 2019 年 2 月中旬或会更早发布。

表 1 特朗普征收汽车关税的影响

	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变动（%）				美国总体就业变动
	进口	出口	生产	就业	
情形 1:美国对所有国家的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的关税	-5.29	-2.53	-1.50	-1.92	-195000
情形 2:在情形 1 基础上其他国家进行报复	-6.70	-8.80	-3.98	-5.07	-624000

<sup>1</sup> 195,000 和 624,000 这两个数字是指关税政策冲击带来宏观经济调整，从而导致的全国失业总人数。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下岗工人可能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也可能失业——经济模型并不能分辨这一点。

数据来源：Sherman Robinson 和 Karen Thierfelder 计算，模型解释见附录

这两种情景都表明了国内产业对进口零部件（或者中间投入品）的依赖——这些零件不是美国生产的，或者难以替代。关税将增加零部件及国内生产成本，使得消费者面临更高的最终产品价格，并且降低海内外需求。消费者很快将会看到，进口车和国产车的价格都会上涨。公司必须决定将多少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者选择压缩利润并吸收这些成本。

一些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将生产地点转移到美国以避免关税。然而，这种搬迁决策必须要考虑到供应链断裂的成本、政府贸易政策变化带来的投资不确定性，以及价格上涨导致的需求下降。

### 1、特朗普关税政策比较

拟议的汽车关税政策将至少覆盖 2080 亿美元的进口——这还不包括汽车零部件（表 2）。这个数字超过特朗普之前的所有关税总和——包括已经征收的关税、仍在考虑的关税和暂时豁免某些国家的关税。

表 2 特朗普关税政策比较

关税目标	政策现状（截止到 2018 年 5 月 31 日）	覆盖进口商品价值
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	有效	103 亿美元
钢铁和铝	有效，部分国家豁免	449 亿美元
1333 项中国产品，主要是机器、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	先前曾被认为“搁置”，现在看来可能在 2018 年 6 月 15 日后实施	462 亿美元
其他中国产品	正在接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审议	1000 亿美元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正在接受美国商务部调查	2080 亿美元（不包括汽车零部件）

资料来源：[Is Trump in a Trade War? An Up-to-Date Guide](#)

### 2、关税对进口影响几何？

2017 年，美国对乘用车、SUV 和小型货车的进口额为 1838 亿美元的，主要来自欧盟（466 亿美元）、加拿大（433 亿美元）和日本（430 亿美元）（表

3)。卡车进口总额为 264 亿美元，其中 92% 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伙伴国家（墨西哥 228 亿美元；加拿大 14 亿美元）（表 4）。

当前美国的汽车关税税率为 2.5%，卡车关税税率为 25%。因此，拟议的额外关税将影响价值 1838 亿美元的汽车进口和 242 亿美元的卡车进口（这一数额来源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当前两国的卡车进口关税率为 0），总计 2080 亿美元。这一金额不包含汽车零部件，因此有所低估。

表 3 2017 年美国进口乘用车、SUV 和小型货车（HS8703）

贸易伙伴	十亿美元
欧盟 28 国	46.6
德国	23.3
英国	8.8
瑞典	2.0
意大利	4.9
斯洛伐克共和国	2.0
加拿大	43.3
日本	43.0
墨西哥	30.6
韩国	15.7
中国	1.8
其他国家	2.8
<b>总计</b>	<b>183.8</b>

注：HS8703：用于运输人员的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公共交通工具除外），包括旅行车和赛车。

Source: 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USITC DataWeb.

表 4 2017 年美国进口（HS8704）

贸易伙伴	十亿美元
墨西哥	22.8
加拿大	1.4
欧盟 28 国	1.2
西班牙	0.4
英国	0.3
德国	0.3
瑞典	0.1
芬兰	0.0
日本	0.8
巴西	0.1
阿根廷	0.0
其他国家	0.1
<b>总计</b>	<b>26.4</b>

注：HS8704：用于运输货物的机动车辆，包括皮卡车。

资料来源：US Imports for Consumption, USITC DataWeb.

### 3、美国出口受损多少？

如果贸易伙伴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或者生产成本的增加使美国制造的汽车对国外消费者来说更加昂贵，那么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2017 年，美国乘用车、SUV 和小型货车的出口额为 511 亿美元，主要面向加拿大，中国和欧盟（表 5）。卡车出口额为 151 亿美元，几乎全部流向加拿大（表 6）。

表 5 美国乘用车、SUV 和小型货车出口（HS8703）

贸易伙伴	十亿美元，2017
------	-----------



加拿大	14.7
中国	10.4
欧盟 28 国	9.1
德国	5.7
英国	1.7
比利时	0.6
墨西哥	3.0
澳大利亚	1.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6
韩国	1.5
沙特阿拉伯	1.3
其他国家	7.8
总计	51.1

注：HS8703：用于运输人员（公共交通工具除外）的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包括旅行车和赛车。

SOURCE: US Domestic Exports, USITC DataWeb.

表 6 美国卡车出口（HS8704）

贸易伙伴	十亿美元，2017
加拿大	12.3
墨西哥	0.7
欧盟 28 国	0.2
智利	0.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

阿富汗	0.2
澳大利亚	0.2
沙特阿拉伯	0.1
科威特	0.1
瑞士	0.1
以色列	0.1
其他国家	0.8
总计	15.1

注：HS8704：用于运输货物的机动车辆，包括皮卡车。

SOURCE: US Domestic Exports, USITC DataWeb.

#### 4、什么是国家安全贸易法？

特朗普对于汽车行业的调查符合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规定。该法律赋予总统极大的自由度，让他可以通过关税或其他措施来限制那些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进口产品。根据这项法律，汽车调查可能会持续 270 天，直到 2019 年 2 月 17 日。公开听证会定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至 20 日举行。此前对钢铁和铝的国家安全调查几乎持续了整个分配期。如果调查结论认为进口确实损害了国家安全，那么特朗普将有 90 天的时间来采取补救性进口限制或其他必要的政策行动。

特朗普是第一个根据“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征收关税的美国总统（钢铝关税）。汽车调查则是美国商务部自 1980 年获得授权以来进行的第 17 次调查。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务部得出的结论是：进口对国家安全不存在威胁，或者总统决定不采取任何贸易行动。对于拟议的汽车关税，打击目标中近 98%（按价值计算）来自于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韩国等美国主要盟友。

#### 附录

在分析关税影响时，我们使用了一个多部门、多国家的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称为 GLOBE。该模型以一个聚焦于贸易部门的 CGE 模型为

基础，使用普渡大学全球贸易和分析计划（GTAP）数据库，旨在描述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模型包含了 13 个国家和地区，42 个部门，5 种劳动力类别和 3 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数据来源是 GTAP 数据库（第 8 版），就业数据来源于 ILOSTAT 就业数据库，更新至 2017 年。

该模型考虑了各部门之间如何通过中间投入和要素市场产生联系。在政策震荡之后，能够计算出使得所有市场出清的均衡的产出、贸易、需求、价格和工资，从而展示了关税变化如何通过价格体系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对于短期情景（2 至 3 年的冲击效应），我们假设所有部门的资本存量都是固定的，并且可能存在非熟练工人失业。我们还假设每个地区的贸易差额都是固定的，因此宏观上，贸易政策对贸易或经常账户余额没有影响（即没有来自国外的额外借款）。

关于 GLOBE 更详尽的描述参见 [McDonald, Thierfelder, and Robinson \(2007\)](#) and [McDonald and Thierfelder \(2016\)](#)。

---

本文原题为“Trump's Proposed Auto Tariffs Would Throw US Automakers and Workers Under the Bus”。本文作者 Sherman Robinson 是 PIIE 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拟模型的领先专家；Jeffrey J. Schott 于 1983 年加入 PIIE，是国际贸易政策和经济制裁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华盛顿逐渐敌视中国，美国人民观点如何？

Craig Kafura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在多项议题上的对华态度逐渐转向强硬。然而，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如何？几十年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作者基于民调数据认为，虽然美国民众对华态度一直相对稳定，但近期美国的社会情绪也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全文如下：

中美关系堪称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如今这一关系的主旋律似乎正在从合作转向竞争。特朗普政府首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发难，其咄咄逼人的姿态引发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相当令人担忧。仅仅三年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表述还是：“美国欢迎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美国致力于与中国构建建设性伙伴关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发布的报告中就已经露骨地表示：“中国试图塑造有悖于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正如中国学者前段时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指出的：“有观点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这种观点正在日益成为美国的共识。”

尽管美国精英阶层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近年来发生了巨变，但社会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却堪称冷静。民调显示，虽然过去 40 年间中美关系多次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向比较稳定。如果用 0 分代表“对中国十分不友好”，100 分代表“对中国非常友好”，则美国公众当前对中美关系的平均评分为 45 分。而四十年前的民调显示，在 1978 年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现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 2006 年，中美关系的民意调查首次问出了“你认为中国更趋向于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当时，49%的受访者选择了竞争对手，而 41%的受访者则倾向于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而如今，对手与伙伴的回答比例依旧是相似的：49%比 50%。

虽然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并不那么热情，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在受访者当中，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仅分别占到 31%和 39%。相比之下，有 78%的受访者认为朝鲜开发核武器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47%的美国人认为应该警惕俄罗斯的领土野心。

有趣的是，有 46% 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一数字比担忧中国威胁的应答比例要大得多。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但确实有不少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近年来国防实力的迅速成长。62%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日益崛起，相比之下，只有 36%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能力在过去几年取得了显著提高。更为有趣的是，只有 5%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衰退，而 17% 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的国防水平在过去几年间受到了削弱。

类似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经贸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但许多人确实认为中国在对美贸易上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笔者所在的智库于 2017 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 26% 的受访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是公平的，而高达 68% 的民众则认为这一关系是不平等的。与 2002 年的民调相比，认为“中美贸易关系不公平”的应答比例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公众第一次对一个崛起的亚洲经济体抱有疑虑。几十年前，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同样引发了美国公众的抱怨。但不同的是，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向不温不火，但其对日本的感情则一向比较友好，即使在美日贸易战期间也大体如此。毕竟，大多数美国人将日本视作美国的重要盟友，而少有美国人认为中国能够成为美国真正的亲密伙伴。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强，这当然也会引发美国公众的关注。我们 2017 年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 6.8 分（满分 10 分），这一得分低于美国的 8.3 分，但高于调查中所有其他国家。事实上，过去 15 年间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一向认为中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力。另外，美国公众并不反感中国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 42%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当在区域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时也分别有 46% 和 43% 的受访者支持日本和韩国扮演类似角色。有趣的是，美国公众并不认为美国应当进一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28%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当减少对国际社会的援助，而 47% 的公众则表示美国在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上应当维持当前水平。不过，虽然美国人欢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并不抱有信心。在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和与邻国的边界争端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并没有扮演积极角色。

如今，中美新一轮又一轮的关税与反关税大战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民众对中美贸易的看法显得愈发重要。显然，美国公众基本认同中美具有不公平的双边贸易关系。但是，美国民众是否愿意承担中美贸易战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代价呢？考虑到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或许普通的美国消费者并不具备复杂的经济学分

析能力，但中期选举中的各个候选人或许会帮助选民塑造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显然，有些候选人会将消费品成本的上升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错误决策，而另一些候选人则会责怪中国政府的报复行为。考虑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大体上并不算热情，后一种观点一旦占据上风，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情绪。同样的，对于中国精英阶层当中的鹰派和鸽派而言，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赋予了双方丰富的策略选项。总之，尽管中美关系正在趋于紧张，但一切还都悬而未决。对于中美两国精英阶层的不同派别而言，其社会公众依然是值得争取的对象。



---

本文原题为“Washington Has Turned on China. Have Americans?”。本文作者 Craig Kafura 为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意与舆情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7 月刊于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欧洲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

Jean Pisani-Ferry / 文 宋海锐 / 编译

导读：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个关于他看似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理论的民间学派已经发展起来。然而，在他对待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的态度这一问题上，没有多少理论可以理解特朗普。编译如下：

自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成为美国总统以来，他的行为惊人的不稳定，但他的政策比大多数观察者所预见的更为一致。特朗普的波动性一直令人不安，但总的来说，他的行动是按照在竞选过程中作出的承诺进行的，也是按照在没有人认为他可能参与选举时便持有的观点进行的。因此，一个关于特朗普看似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理论的民间学派发展起来。

### 1. 特朗普对欧盟的立场

最新的挑战是了解特朗普对欧洲的立场。在 6 月 28 日的一次集会上，他说：“我们热爱欧盟国家。但当然，欧盟的成立是为了利用美国。而且你知道的，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最近访问欧洲大陆期间，他称欧盟为“敌人”并称其“可能与中国一样糟糕。”关于英国脱欧，他宣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应该“起诉”欧盟。随后，美国与欧盟于 7 月 25 日停战：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同意共同致力于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

所以似乎欧盟与美国再次成为了朋友，或者可能只是在争议恢复之前的休息。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特朗普一再袭击美国最古老、最可靠的盟友？为什么他似乎如此深深地鄙视欧盟呢？美国为什么要试图破坏欧洲，而不是与欧洲寻求更密切的合作来保护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

鉴于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迅速崛起是美国主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特朗普的做法就尤其引人注目。与早先的愿景相反，由于国家和执政党在协调活动中的作用仍然大得多，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逐渐与西方趋同。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建立客户群，最明显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并打算“培育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美国在二十世纪推行的模式。在军事上，中国已经开始了重要积累。显然，中国而非欧洲是对美国世界霸权的头号挑战。

前总统奥巴马的中国战略结合了对话和压力。他开始建立两个排除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型经济联盟：与其他 11 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但特朗普将美国从 TPP 中撤出，并在 TTIP 诞生之前将其扼杀。然后他制造了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裂痕。同时，他攻击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德国。

## 2. 如何解释特朗普对欧盟的这种立场？

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是特朗普对双边贸易平衡的特殊痴迷。根据这种观点，特朗普认为德国、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国都是同样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但没有人认为这具有经济意义。他可以从这一战略中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伤害并削弱长期存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但至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抱怨梅赛德斯汽车。

第二种解释是特朗普希望阻止欧盟将自己定位为三方游戏中的第三个玩家。如果美国打算将与中国的关系转变为双边权力斗争，那它就有充分的理由将欧盟视为一个障碍。由于欧盟本身受法律管辖，欧盟必然会反对以纯粹的交易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而且一个统一的欧洲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参与者。但当欧盟遭到破坏后，如果它不解散，弱势且分裂的欧洲国家将别无选择，只能团结在美国之后。

最后，对特朗普行为的更加政治性的解读是，他正在寻求欧洲的政权更迭。事实上，特朗普没有掩饰地相信，欧洲“正在失去其文化”，因为欧洲让移民“改变了其结构。”同时，特朗普的前任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宣布，他将把此生一半的时间花在帮助欧洲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联盟上，并在明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

几个星期以前，只有第一个解释似乎看起来有道理，其他两个解释可能会被当作是由阴谋论所激发的幻想从而被摒弃。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曾将欧盟列为削弱美国的一种阴谋。事实上，所有那些特朗普的战后时期的前辈们都会对让欧盟解体的想法感到震惊。但美国总统对欧洲已经采取了太多的行动，以至于难以避免更为悲惨的局面。

## 3. 如何重塑欧洲？

对于欧盟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它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诞生，并得到了美国的祝福。从那以后，它被建成一个在美国保护下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背景下进行的地缘政治实验品。出于这个原因，它的外部维度—经济、外交或安全，始终是其内部发展的第二位。

最近的危机意味着上述情况已不再适用。欧洲现在必须确定它对这个更加疏远、可能充满敌意的美国的战略立场，同时确定它对那些没有理由善待它的新兴大国的态度。欧洲必须代表其自身的价值观，必须紧急决定它打算在安全和防御、邻里政策以及边境保护方面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经济上，欧盟仍有潜力成为全球参与者。它的市场规模、主要公司的实力、统一的贸易政策、共同的监管政策、单一的竞争管理机构以及仅次于美元的货币是其主要资产。它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它们来推动国际关系的改革，以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正当不满以及中国对其国际作用的正当关切。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可以为贸易、投资或金融做同样的事情。

欧洲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岛屿与大陆、北方和南方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分裂。这些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什么定义了一个国家？谁负责边界？谁保证安全？欧盟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还是纯粹的国家利益？

如果欧盟未能在这个与十年前根本不同的世界定义自己的话，它可能无法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机构而存在。然而，如果它成功定义自己，它可能会重新获得公民眼中的目标感和合法性。

---

---

本文原题为“Is Europe America’s Friend or Foe?” 本文作者 Jean Pisani-Ferry 为巴黎政治大学和柏林赫蒂管理学院的教授，他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竞选纲领和思想的负责人。

本文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的“全球经济与治理”话题下，Bruegel 是专注于经济学的欧洲智库。[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银行救援与全球银行格局

Patrick Bolton, Martin Oehmke/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当银行大而不倒的时候，银行救援方案会因其全球范围的本质与国内规定的错配而无法奏效。这篇专栏认为当一个“单点进入”的方案足够好时，它可以满足当地规则机构的利益，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考虑到单国政治限制与激励，有效的救援方案不一而足。编译如下：

全球规则制定者该如何解决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很多人认为银行救援是解决这一危机的最好方式。其主要思想是全球系统性银行应该以长期次级债或者权益的方式发布“总吸收亏损资本”（total loss absorbing capital, TLAC）。这些债券被用于吸收损失，并为银行救援提供再融资。在此情况下，银行运营被干扰的程度会减到最小，也不需要公共支持。

但是这些救援方式怎样呢？更重要的是，它们会奏效吗？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当前大约有 30% 的系统性银行，在 2014 年却占到了全球 GDP 份额的 75%。

### 全球和当地

在我们近期的论文中，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跨国银行救援框架的方法。设计有效救援方式最主要的困难是其跨国本质与本国政策救援限制的错配问题。

因此，设计救援方案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本国的政治限制和激励。在标准公司金融和银行理论的原则下，我们使用了一个系统性风险银行单独的衡量标准——单点进入方式（single-point-of-entry, SPOE）。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利用总吸收亏损资本，同时适用于全球银行。

但这种全球救援方式不总是与当地法规协调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提出一个在当地政策下适用的解决方案会更好，即多点进入方案（multiple-point-of-entry, MPOE）。

### 事前和事后

国家利率在事前（设定方案的时候）和事后（方案施行的时候）都很重要。从事前角度看，SPOE 方法通常会假设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转移。转出地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阻碍设定全球 SPOE 解决方案。尽管全球救援方案更加有效，但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出于政治考虑只会关注本国的发展，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建立国家内部的解决方案，防止资本流向其他国家。这会给设定 SPOE 解决方案带来困难。这些困难与欧盟建立所遇到的困难是一致的。

而事后的困难则在于一个全球 SPOE 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加严肃。国家政策制定者可以在方案实施后选择放弃。但是跨国流动下实行 SPOE 解决方案工程太过庞大，一国政策制定者会通过设立障碍来阻止资金流动。

这是最坏的结果，可能会导致 2008 年雷曼兄弟垮台后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需要考虑事后破产的可能性。如果政策制定者知道全球 SPOE 方案会在事后变得无效，那么单独使用 MPOE 可能会更好。

### 什么决定了哪种方案是适用的？

一个全球的 SPOE 方案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风险记录与全球银行的运营结构。

银行的风险记录很重要，是因为转账的规模是关于跨国银行现金流和资产价值的函数。银行的运营结构很重要，在于本国政策制定者的制定解决方案的时候会对比在国境内银行转型的成本和让银行破产的成本。

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系统性风险银行的解决方案不一而足。解决方案应该考虑到银行的风险结构和在不同地区的运营方式。一个全球的 SPOE 方案只有在不同地区有较大的互补性，并且在一国境内面临破产风险的时候才能变得有效。这种激励相容可能有时会诉诸混合方案，即在解决方案施行之前就将总吸收亏损资本分配给不同的地区。这种预先分配可以减少事后转账，增强激励相容，但是也可能减少资源共享带来的好处。

### 激励作用

我们也调查了这些解决模型给全球银行带来的影响。股权由双重作用：外部股权（长期借贷）可以减少吸收资本的损失，而内部股权对银行经理来说是重要的激励。

我们的模型表明，全球 SPOE 方案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全球银行激励。与 MPOE 相比，SPOE 可能会减少激励，因为在一国产生的现金流可能有事会被转移去填补另一国的窟窿。但是 SPOE 减少了风险资本的损失，使得银行可以拥有更多内部股权，从而可以为银行经理提供更强的激励。第二，如果 SPOE 方案的多样化收益足够多，正面影响就会发挥主要作用。

---

---

本文原题为“Bank Resolu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Banks”。本文作者 Patrick Bolton, Martin Oehmke 是 VOX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8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增值税对中国制造业的动态影响

Haichao Fan, Yu Liu, Nancy Qian, Jaya Wen/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增值税的执行需要追溯到两个公司间交易的准确记录。本专栏描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征税流程的数字化管理来加强执法力度，从而在短期内提高税收收入。但是，执法力度的增加会导致公司在中期收缩，减少长期的税收收益。编译如下：

增值税（VAT）约占全球税收收入的五分之一，并被用于全球 160 多个国家。增值税一般根据公司的销售额和投入之间的差额来征收，这一设定会产生低估销售额和夸大投入的激励效应。因此，在企业与企业的交易中，双方面临着扭曲交易价格的相反动机。这种现象表明，增值税能被企业更为规范地执行，这在官僚能力较低或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可能尤其重要。

有效的执行是获取这些税收的必要先决条件，增值税的执行需要可以准确追溯到两个公司间的交易记录。鉴于国家经济活动体量巨大，这对征税机关是一项大的挑战。在本专栏中，我们将探讨信息技术是否可以改善增值税的执行力度。我们还分析了在短期和中期增加执法力度将会如何改变公司行为。这个问题的经济和政策含义是，增加执行力度的政策效果是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加还是减少，关键取决于企业的反应。在本专栏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的情形，其 2001 年的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分析执行增值税带来的效应。

1994 年，中国首次引入增值税时，所有销售和采购的发票都是手写的，所有交叉检查都是手工完成的。结果，检测到假的采购扣除和遗漏的销售收据异常困难；伪造采购发票和故意少报销售额的现象都很普遍。

政府意识到了这些缺点，并努力提高执行能力。2001 年，政府发起了金税工程（其名称与 1996 年终止的政策相同）。通过这项改革，中国政府将整个增值税流程数字化——发票的生成，公司提交给税务局的交易报告，现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检测逃税行为。新的、基于计算机的系统为每次交易分配了一个唯一的，加密的 84 位代码，这就把公司与交易联系起来。结果，通过虚假的采购发票逃避税收和故意少报销售额变得特别困难。该系统是强制性的，并于 2002 年底正式完成部署。

虽然新技术明确增强了税收的执行力度，但增强执行力对收益的影响尚不确定。例如，增值税引起的公司的事前反应是不确定的。一方面，逃税减少理应增加税收。但企业也可能缩小规模，因为更强的执行力度会带来更高的有效税率，而企业缩减规模会减少税基和整体税收。

为了估计公司的反应，我们不能简单地比较政策前后公司的行为。许多其他变化可能同时发生，公司行为的任何差异都可能是由于这些变化而不是金税工程。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政策效果的强度应该在不同的行业有系统性变化。通过比较受增值税执行力度加强影响大和影响小的公司，分析金税工程对公司微观行为决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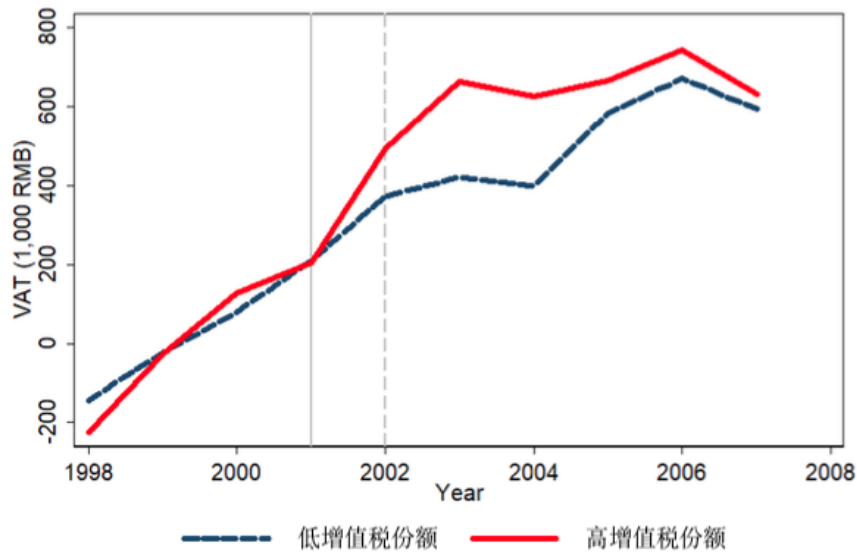
增值税执行力度的变化出现在哪里？数字化后，中国的所有公司都面临着统一的高水平的执法。但在该政策出台之前，税务机关将其有限的精力集中在较小的公司上。对于那些面临高强度前期审查的公司而言，改革带来的执法变化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化，面临很少或没有前期审查的公司面临着执法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实际中，前期审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行业结构。审计师将注意力集中在可扣除投入与销售额之比较低的行业，我们将其称为“增值税份额”。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多报采购或少报销售，但在最终增值税的税率中只会产生相对较小的扭曲。这些行业在逃税方面的结构优势导致税务官员更加认真地审计它们。因此，在金税工程提高执法强度虽然是统一面向所有行业的，但低增值税份额的行业面临的变化较小，而高增值税份额的行业面临的变化较大。

通过比较高增值税份额行业企业的行为与低增值税份额行业的行为，我们可以将数字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离开来。但是，我们在计算增值税份额方面面临实证挑战。一方面，2001年之前的中国数据被逃税扭曲了。另一方面，2001年后的中国数据包括改革的后果。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美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来构建每个中国行业增值税份额的衡量标准。我们使用中国的扣除规则来计算每个行业可抵扣投入的份额，然后将美国的行业与中国的行业进行匹配。我们认为，美国的数据捕捉了每个行业的基本特征，没有特定背景的规避和变化效应。

通过衡量增值税份额，我们可以探索政策的后果。在图1中，我们比较了增值税份额中高于和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平均报告的增值税。在改革之前，我们观察到这两个群体的趋势非常相似。此外，在改革之后，我们发现高增值税份额的公司从2002年到2004年支付了相比较而言更多的增值税，但差距在2004年到2007年有所下降。这一证据表明改革对增值税支付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是积极的，但其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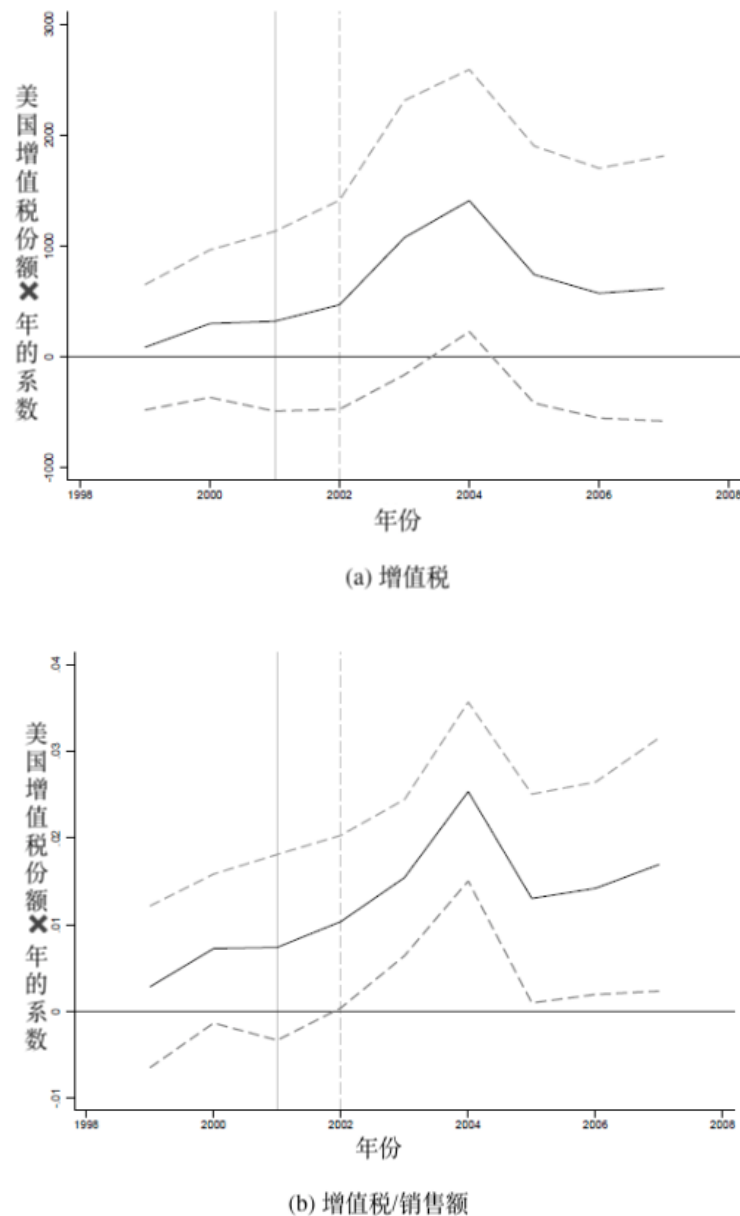
图1 平均增值税



注：数据被标准化以便可进行比较。每组在数字化前的均值都从每组的增值税额中减去了。

当我们控制住更多的变量时，这种一般模式仍然存在。在图2中，我们提出了高增值税份额公司和低增值税份额公司之间的估计差异。通过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我们可以消除给定年份内同样影响所有公司的任何变化，以及公司之间的任何长期差异。我们还控制了与年固定效应相互作用的初始规模，初始规模会在每年内根据规模大小来吸收公司行为的差异。正如图1所示，我们观察到，2004年之前，高增值税份额公司的增值税支付的有更为明显的增加，2004年后开始下降。

图2 增值税和增值税/销售额的估算值



注：这两张图绘制了增值税份额和年度虚拟变量的相互作用系数（控制了数字化前的平均销售额与年度固定效应的相互作用，以及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的相互作用）及其90%的置信区间。样本是从1998-2007年的平衡的公司面板数据。参考年份是1998年。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框架解释这些结果。假设企业可以应对政策变化，但其中的一些投入，如固定资本，却无法快速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执法力度的增加将提高有效税率。企业希望缩小规模以应对有效税率的提高，但他们无法改变所有的投入。从短期来看，少量公司缩减规模和税率的提高将导致整体

税收收入增加（如果需求不太具有弹性）。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将会根据新的税收制度进行全面调整。他们将选择更少的投入并减少产出，这种影响将减少税收的增加。

这种解释对我们可观察到的其他公司也有影响；它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销售、投入和雇佣应会稳步下降。此外，生产率——在概念上类似于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应该会稳步增加。当我们检查这些变量时，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的解释一致。增值税的增加导致公司在中期收缩。

对增值税支付的短期增长和长期衰减的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学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逃避。传闻表明，逃税仍然存在——公司可以从黑市购买合法的发票。这种解释意味着，在短期下降之后，企业的可扣除投入应该会再次上升，因为公司在新的体系下学习如何伪造可抵扣额。然而，当我们检查可抵扣投入时，我们发现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单调下降。因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学习了新的逃避方式。

这些模式表明，信息技术可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这一结果涉及探索技术在治理中的作用的文献。例如，迪弗洛（Duflo）等人在 2012 年的文章中提供了实验证据，证明印有时间的照片可以提高印度教师的出勤率，穆拉里哈兰（Muralidharan）等人在 2016 年的文章中表明，生物识别技术提高了印度农村地区的国家补贴。

我们还扩大了有关公司对于税收执法的反应的证据。我们的估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证明中长期影响可能与短期影响不同。特别是，我们认为企业可能会因税收执法的增加而缩减规模，而这些实际影响表明，更严格的征税程序可能在场内减少税收收益。

---

本文原题为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omputerised VAT Invoices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本文作者是 Haichao Fan, Yu Liu, Nancy Qian 和 Jaya Wen。本文于 2018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商事法庭提上日程

Jonathan E. Hillman and Matthew P. Goodman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各异，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伴随着大量的跨国商务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在西安和深圳分别成立了两家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作者认为，一旦中国掌握了区域内国际商事争端的仲裁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都有可能面临威胁。全文如下：

今年二月，在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争端后，吉布提单方面宣布终止与总部位于迪拜的 DP World 早先签署的集装箱货柜码头的合作关系。观察人士猜测，吉布提很可能随后将这一码头交由中国企业经营。在此之前，吉布提已经在港口附近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这个集装箱货柜码头的地理位置非常微妙：几英里之外便是美国在非洲设立的唯一永久性军事基地；而在更近的地方，则坐落着中国目前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今年三月，在国会听证会上，一位美军高级将领向国会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接管这一港口，会对美国产生至关重要的战略影响。”

这一案例启示我们，随着中国推进其宏伟的一带一路倡议，类似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交织的国际争端将会越来越常见。因此，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在海外推动重大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同时他们也日益重视推广与其国家利益相匹配的国际规则。显然，这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最近，中国决定成立两个致力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经贸纠纷的国际商事法庭，这一重磅新闻再次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上述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将于 2018 年 7 月 1 日正式在深圳和西安成立，分别负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相关纠纷。虽然目前这些法庭还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但终有一天，它们将在国际舞台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众多且国情各异，因此其相关项目难免产生争端。大型工程往往会遭遇工期拖延、预算超支、收益衰减等棘手问题，而一旦工程遭遇问题，各相关方自然会想方设法寻求补偿，这也就种下了争议的种子。从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大型工程产生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合同执行不力或合同制订不周。大约 32% 的国际合作工程都产生过纠纷，平均而言这些纠纷需要耗费 14 个月才能使各方达成共识，另外这些纠纷平均而言还会带来将近 4300 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实证数据显示，亚洲国家的国际工程纠纷是最为昂贵的，其带来的平均经济损失高达 8400 万美元。

事实上，工程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庞大的国际工程都一定会遭遇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了全球营商环境最为复杂的一些国家。举例来说，在一带一路途径的南亚，超过



70%的国家至今还依靠纸质记录来登记土地产权，这无疑会给相关交易增加可观的成本。据世行统计，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所有国家中，平均通过地方法庭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是 621 天，这意味着沿线许多国家还相对缺乏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正是因此，传统上许多投资者都选择避免在充满风险某些亚洲国家投资，而这些国家当中不乏大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者。

正是因为商业纠纷如此常见且历史悠久，国际上早有通行的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而这些机制的细则往往已被阐明在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协定、以及具体的商业合同当中。举例来说，在前文提到的吉布提案例中，DP World 便决定向伦敦国际商事仲裁法庭提出仲裁申请。据报道，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相关的仲裁申请也被提交到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仲裁法庭。曾经在 50 年代起草了著名的《纽约公约》的国际商会最近也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用于解决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商业纠纷。

那么，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将如何与这些既有的机构相竞争呢？从现有的说法来看，中国主打的卖点与亚投行的口号相似，即“精干、廉洁、绿色” (Lean, clean, and green)——中国承诺为各国企业提供高效、廉价且公正的仲裁服务。诚然，中国准确抓住了一条重要的市场痛点，不过市场会对此作何反应，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对中国而言，其商事法庭最有吸引力的卖点在于其掌握的资源。中国向沿线许多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伸出极具诱惑力的橄榄枝，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提出的附带条件自然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难以接受。举例来说，由中国投资的一条在黑山共和国修建的高速公路，其合同条款便明确要求任何相关商业纠纷应交由中方的国际商事法庭进行裁决。

对于观察家而言，这些举动背后最深刻意义在于，中国正悄无声息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此外，通过增强商业纠纷仲裁的话语权，中国也可能伤及美国的战略利益——吉布提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了沿线大型投资项目的最主要参与方。而一旦其主导的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中国还将同时成为法官和裁判。毋庸置疑，这一切都值得引起美方的高度警惕。

---

本文原题为“All Rise? Belt and Road Court is in Session”。本文作者 Jonathan E. Hillman 是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首席研究员。Matthew P. Goodman 是 CSIS 高级副主任，亚洲经济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7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税收改革评估之新探——基于 IMF 新数据库

Era Dabla-Norris 和 Ruud de Mooij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税收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仅有税率的定量信息，而没有税基的定量信息。本文引入一个全新的，针对公布税收改革信息的 IMF 数据库，利用文本挖掘的方式，对过去 40 年中，23 个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税收改革，进行多维度推断。这个数据库包含了直接和间接税种，能够帮助解决当前税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并且为税收政策的新研究提供机会。编译如下：

2016 年，Laura Kawano 和 Joel Slemrod 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评判之前对企业所得税的拉弗曲线估算的研究（Kawano and Slemrod 2016）。之前的研究将企业税收对企业税率的二次函数做回归，并从中推断出收入最大化时的税率。Laura Kawano 和 Joel Slemrod 表示，这些研究忽略了公司税基的信息，而税基往往会按照一定规律，随着税率发生变化，因此低估了企业税收与企业税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当校正其中的遗漏变量偏误后，收入最大化时的税率从 30% 变化到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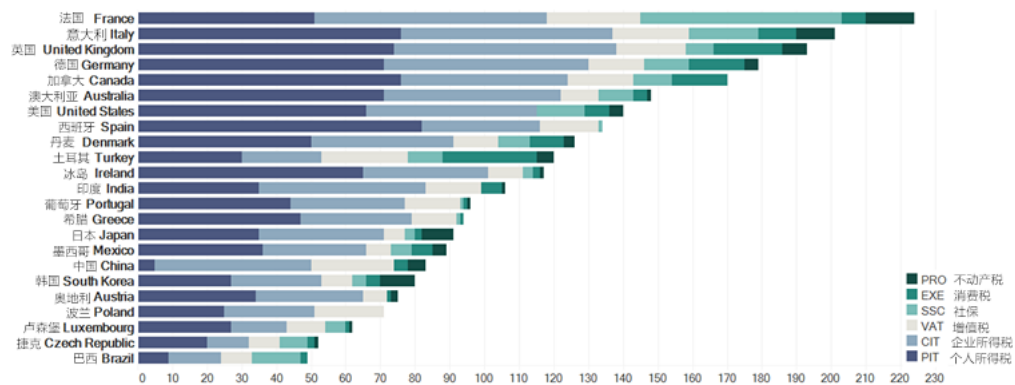
Kawano and Slemrod 的研究提出了税收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仅有税率的定量信息是可以获得的，而税基的定量信息无法获得。为了解决这个缺陷，大量研究选取税收的其他指标，如真实纳税额度，来衡量税率和税种的联合作用。在分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选取税收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税收负担的自变量。但是这样的回归设计也可能产生估计偏误，因为税收占 GDP 的比重也由 GDP 的增长率决定。

为了解决这些方法论的问题，IMF 开发了一个全新的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Tax Policy Reform Database），并已在 2018 年的 4 月向公众开放。该数据库运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对在过去 40 年间，23 个国家进行分析，使用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提供的 900 多份经合组织报告和 37000 多条新闻剪报，提炼出大量税收政策改革的信息。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对很多信息进行报告，如税率和税基的变化，改革宣布和施行日期，这些措施是否经过多年施行，该税收改革是重大改革还是小改革，以及这些改革是否作为金融整顿计划的一部分施行。

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可以用来推断不同国家间的税改的系统性趋势以及提供国别研究。例如，数据显示，这 23 个国家在过去 50 年中平均施行 130 项的税收改革，主要针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份名单中分列一二，均施行了超过 200 项税收改革政策，巴西和捷克排在这份名单的末尾，都施行少于

50 项的税收改革政策（见图 1）。在对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中，主要是对税基的调整，在针对增值税的改革中，主要是对税率的调整。从政策宣布到政策施行的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是 150 天，但是方差很大。有趣的是企业税率的降低，近来伴随着企业税基的收窄，这不太符合常理。Amaglobeli 等学者在 2018 年的研究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图 1 税种以及不同国家税改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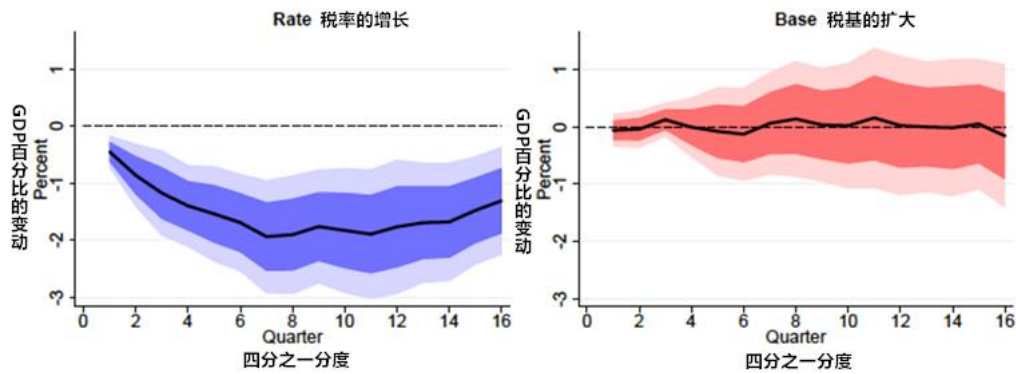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Amaglobeli et al. (2018)

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同样可以解决一些现有税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且允许研究者分析新问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关于税收与增长问题：

- 首先，税收改革数据库包含一些信息，比如，该项税收改革是否是在财政整顿年份（在这些年份里，税改更有可能与商业周期不相关）中施行。这有效防止内生性问题，因此更有可能获得无偏估计结果。
- 其次，税收改革数据库不但能够分辨不同的税收分类，并且能够分辨是税率的变化还是税基的变化，能够分辨是税率还是税基的变化更加重要（参考 Dabla-Norris and Lima 2018）。的确，当对同样的财政冲击进行标准化时，税率的增长，相较于税基的扩大，与经济长期增长（包括出口和就业）有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如果是通过改变税率而不是改变税基，短期所带来的税收乘数将显著更大。

图 2 税基扩大的增长效应 V.S. 税率增长的增长效应



数据来源：Dabla-Norris and Lima (2018)

另外一个例子是税收竞争战略。之前的研究已经通过将一国家的税率对其他国家的赋予权重的平均税率进行回归，来估计财政反映函数，并且成功运用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从多方面丰富了研究分析，就像 Hebus 等学者在 2018 年的研究中所展现的一样：

- 通过观察国家如何对税收改革的宣布和施行进行反应
- 通过探索控制税基变化的重要性
- 通过考虑其他国家是否有使用税基调整作为税收竞争手段

很多其他的税收问题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改革数据库进行解决，IMF 的研究人员也正在努力探索。例如，我们准备看一下税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影响：税改是如何影响选举的？选举会影响税改政策的宣布、施行和撤销吗？我们同样致力于探索单项税收改革是否在不同的税改计划中有不同的含义，并且致力于观察经济危机期间税改政策的具体效应。

---

本文原题为“Advancing the Evaluation of Tax Reforms: A New IMF Database”。本文作者 Era Dabla-Norris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的处长，Ruud de Mooij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税收政策部的处长，本文于 2018 年 8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分区制对房价的影响

Ross Kendall 和 Peter Tulip /文 杨茜/编译

导读：政府通过分区制政策来限制住房供应。实际证据表明，分区可能对土地价值产生巨大影响。我们采用间接方法，将房地产价格与边际供给成本进行比较，发现分区制将提高独立式住宅、公寓相对于供应成本的平均价格。编译如下：

政府通过分区制政策来限制住房供应。实际中采取了包括限制订购数量、规定最大建筑高度和规划审批流程三种措施。虽然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带来好处，但它们也会提高住房价格。我们的研究试图量化分区对澳大利亚四大城市房价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分区可能对土地价值产生巨大影响。例如，Wyndam Vale（墨尔本以西 40 公里）的一片 363 公顷的土地从农村分区为住宅后，价值从 1.2 亿美元增加到 4 亿美元，这样的例子很常见。与土地本身实际稀缺导致高土地价值和房价的观点不同，分区变化导致土地价值大幅增加的可能解释是政府允许建造住房带来了高影子价格。然而，很难衡量这些事件的代表性，或者分析它们随时间或地点变化的情况。

考虑到从具体分区规则中推断出估计值的困难，我们采用间接方法，将房地产价格与边际供给成本进行比较。对于独立式住宅，这意味着将财产价值分解为建筑成本和该地区的实际土地价值，其余部分归因于分区限制。

例如，我们估计 2016 年悉尼房屋的平均价值为 116 万美元（约合 850,000 澳元），这代表价值 765,000 美元的土地上的建造成本为 395,000 美元。土地昂贵，但不是因为它物理上很稀缺。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土地价格高昂，但房主并不计算土地的价格。我们在调查房价如何随着不同的特征变化时发现，购房者认为土地价值仅为每平方米 400 美元左右，或者说悉尼的房屋平均土地价格为 276,000 美元。土地的边际或实际价值代表了额外土地的机会成本，这可以通过人们准备为这块额外土地支付的价格来判断。估计值比市值低了 489,000 美元。这种差异代表了房主需要为居住在该地段付出代价，或者说是管理稀缺资源的成本。

换句话说，排除分区的影响，悉尼房屋买家本可以以 671,000 美元的平均价格获得房屋——建造该房屋将花费 395,000 美元，土地所有者（现有的或潜在的）已准备好以 276,000 美元的价格放弃土地。但相反的情况是，买家需要支付 116 万美元，比供应成本高出 489,000 美元（约 73%）。

平均（或市场）价格与土地边际（或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异代表套利机会。在没有分区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购买土地边际价值低于平均价值的房产，将其



细分为多个较小的房产，并赚取利润。产生这种利润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要坚持这么做需要面临一些障碍。对于大多数城市土地而言，细分是非法的，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完全竞争或生产滞后，似乎在经验上看并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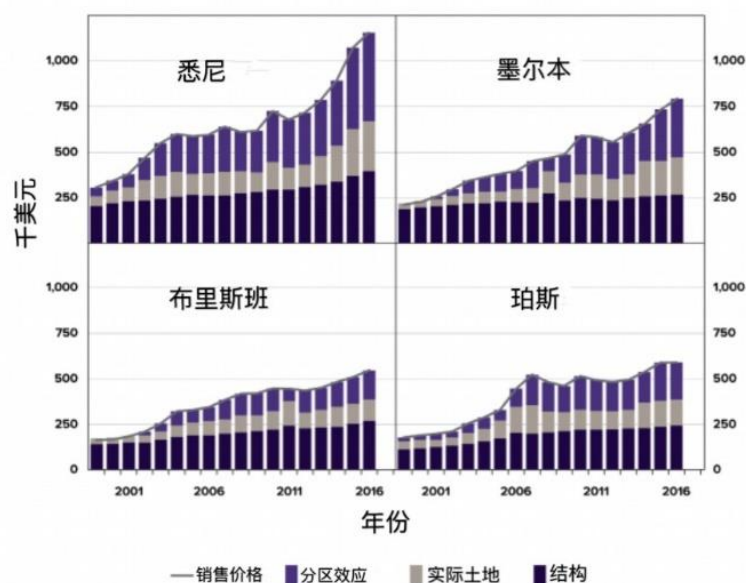
这种影响是相似的，但在其他城市则较小。我们估计，分区制将提高独立式住宅相对于供应成本的平均价格，其中墨尔本为 69%，布里斯班为 42%，珀斯为 54%。作为总价格的一部分，分区制的贡献分别为 42%（悉尼），41%（墨尔本），29%（布里斯班）和 35%（珀斯）。更高密度的住宅需要稍微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我们估计，分区制使悉尼的平均公寓价格相对于边际成本提高了 85%，墨尔本为 30%，布里斯班为 26%。这些估计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定性发现相似，包括侧重于南加州、佛罗里达、新西兰、曼哈顿和欧洲的房地产价格的研究。

如图 1 所示，分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这种增长似乎可归因于需求的增加——由于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和利率降低——与持续阻碍供应紧张的法规相互作用。

我们的方法是狭义和局部均衡的。我们不会检查分区对数量、收入或其他措施的影响。我们也没有研究分区的好处，例如拥堵的外部性。我们的方法不允许我们估算房价的差异与没有分区制的反事实比较，因为这需要估计需求和供给曲线的斜率。

我们方法的另一个限制是，因为我们间接地估计分区的影响，作为残差，我们对边际成本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估计中的任何误差都会流入我们估计的分区效应。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对成本的估计依赖于某些假设，这些假设认为我们是合理的，但难以量化。

图 1 房价分解



注：本研究简报基于 Ross Kendall 和 Peter Tulip，“分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研究讨论文件 NO.2018 - 03，2018 年 3 月，<https://www.rba.gov.au/publications/rdp/2018/pdf/rdp2018-03.pdf>。Ross Kendall 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工作期间合著了这篇论文。

---

本文原题为“The Effect of Zoning on Housing Prices”。本文作者 Ross Kendall 为新西兰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Dana Galizia 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8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本期智库介绍

###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http://www.chathamhouse.org/)

###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